

与辛亥名人的友情

章士钊是亲历五个朝代的风云人物，他与孙中山、黄兴有着深厚的友谊。孙中山曾说：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他与章太炎是结义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史上皆建有不朽的功绩。他与有“先生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美誉的于右任关系非同一般，即使解放后海峡相隔，也未阻断二人的诗文唱和。清末志士吴樾，异姓兄弟邹容、辛亥同乡蒋翊武，以及许多辛亥先烈都使他难以忘怀。

章士钊与黄兴

章士钊与黄兴是同乡、同学、同志和战友。章士钊曾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①在孙中山等广东人看来，章士钊则是典型的黄兴派。黄兴要是不过早辞世，章士钊的后半生可能是另一个模样。

走向共和，同组华兴会

章士钊和黄兴都是湖南长沙东乡人，不过黄比章大7岁。他们一度在武昌两湖书院同过学。至《苏报》案发生前，他们虽有往来，但仅限于一般的应酬。当《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开始正式投身革命。这才有“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江督魏光燾第三子，新由东京返国）；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②

龙砚仙（1854—1918），即龙璋，别号璧勤，晚号潜叟，湖南攸县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世家，其曾祖龙彬为秀

①、②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8，第321、311、312页。

才；祖父龙友夔为恩贡生、国子监学正、候选教谕；父亲龙汝霖为举人，曾在山西曲沃、高平，江西安远、铅山等地任知县，后升任直隶州知州；二叔龙溥霖为举人，以候选同知，先后任广西候补知府、署桂林平乐等府知府、泗城府知府，因军功加补用道；三叔龙湛霖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是一代名宦。龙璋本人自幼即刻苦研读儒家典籍，才华横溢，22岁就乡试中举，名声大噪。中举后，曾先后七次入京参加会试，但都失意而归，在科举场中追逐功名近20年；1894年以中书改官知县，先后任江苏沭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地知县（记名候选道员），时间长达10余年，1907年因母丧丁忧辞官回籍。龙璋一直紧跟时代潮流，先后与杨毓麟、黄兴、蔡锷、宋教仁、周震鳞、焦达峰、陈作新等结交，大力支持革命活动，尝试利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1903年，黄兴、章士钊为筹集建立华兴会的经费，特赴泰兴拜访龙璋，“专以此事就商，结果如愿以偿”。^①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龙璋的寓所西园召开的，龙璋亲自与会。龙璋还动用自己的所办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由上海秘密购送长枪500杆、手枪200枝存放在长沙市郊，以供华兴会长沙起义之用。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因藏匿于龙璋家中才得免被捕。同年，黄兴因万福华案在上海被捕，蔡锷赶到泰兴向龙璋求救，龙璋“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营救”。最后，又是龙璋向会审公廨把黄兴保释出狱。1911年春，黄兴派人到湖南为黄花岗起义筹款，龙璋当即赞助3万元。同年2月，焦达峰、陈作新、龙璋等百余人在龙璋住宅开会，商议响应广州起义的办法。章士钊亦曾指出“辛亥以前，由海东贯长江，略洞庭而南，上下数千里间，吾党所为处心积

^①龙伯坚：《龙璋事略》，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2页。

虑，不论激随隐显，殆莫不有龙氏一门（包括龙璋、龙湛霖、龙绂瑞、龙毓峻等——引者注）之心计与血汗渐浸其中。”^①其中龙璋的贡献最大。

华兴会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发动了多次起义，前赴后继，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华兴会则与黄兴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它成立于1903年的长沙，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共12人。其中10人是湖南人，黄兴、章士钊外，还有刘揆一、胡瑛等人。会后，章士钊返回上海，创办《国民日报》，兴建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印刷邹容的《革命军》和他自己撰写的《孙逸仙》、《沈荇》等革命小册子，继续其革命宣传工作。黄兴则留在长沙，以明德中学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成立了华兴会机关，联络会党，随时准备起义。龙莫溪在其笔记中曾这样记载：

华兴公司，赁屋于南门外为之，表面标榜兴办实业，里面直是革命组织。无何，外间指目克强为革命党，谣言稍起。九月二十五日，余在家中宴客，克强与焉，扬扬如平时。唯笑谓余：“有相士谓我，将有缙继之灾。”余曰：“此无稽谰言，公何言之？”时克强寓紫东园，忽报寓所有士兵搜检，里衙遮阻，人不得出入。寻知会党首领马福益部失风，于醴陵车站被逮，词连黄廩午老师，即克强也。余亟引克强入西园密室暂避，而外察形势。时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贻，皆素交，且通达时务，无意兴大狱，事稍缓。是夜，克

^①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强以布置革命实况见告，党众约 2 万余人，教员学生居多，惟无一语及新军。此或克强不欲激动俞寿丞，俾便相助，亦未可料。综计克强所语要点，归宿于十月十日那拉后万寿节，百官赴皇殿庆祝时，一举轰之，从而四方响应，庶几成事。今事已破坏，无取渎叙，现同志被获者不知几何人，如事态扩大，为首者谊当到官，何忍独生云云。胡子靖、谭祖安均在座，闻此言，则共劝慰毋躁，以图善后。克强又言：有一藏置秘件之小箱，存西长街长沙中学室内，不可放佚。余假托谒客，衣冠出门，迳往该中学携归，就中册籍名纸，悉数焚毁，不留痕迹。克强因取自用水晶小印章赠余，已则读书自遣，饮啖自如，如是者三日。寻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及湖北曹亚伯掩护出乡赴沪。久之，湘抚端方谓余：“足下胡乃放走黄兴？”张小浦从旁答曰：“龙莫溪不能卖友。”亦遂释然。^①

黄兴到上海与章士钊等人会合后，又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原有华兴会外，又在湖南增设同仇会，以联络红帮弟兄。在上海另建立爱国协会，以团结革命志士。因黄兴名声太大，他本人又坚决不肯任会长，于是由杨笃生为主、章士钊为副组成领导机构。蔡元培、陈独秀、蔡松坡等人均在杨笃生的监督下加入了爱国协会。他们计划是以暴动为主，并进行暗杀活动。由于杨笃生是学习化学的，便由他进行武器的研制与试验。不久，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失败被抓，章士钊前往狱中看望，连累爱国协会 10 多人入狱。黄兴与章士钊二人更是难逃劫难，先后被抓入牢中。

^①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人物志》（上册），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1 页。

后由于各方面的帮忙，他们才得以先后出狱，并前往日本。对于这一段经历，章士钊后来曾以诗记其事。诗曰：

醴陵初失律，歃血同黄杨。
协会谥爱国，杨主而吾襄。^①

正是这次在东京，黄兴得以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在原有兴中会、华兴会等组织的基础上组建起了同盟会，中国近代革命从此走上了崭新的道路。

但此时，章士钊回首自己数年的生活道路，认为革命必须有分工不同，自己未到壮年，应当发愤读书，对政法等问题有所研究，才会对革命有用。于是，他不顾章太炎等老朋友的劝说，坚决拒绝加入同盟会组织。人们对此很不理解，加上当时参与劝说的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后来成为了章的夫人，以致在近代史上留下了章行严与同盟会的关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逸闻。

后来还是章本人与黄兴谈了自己这一观点后，才得到人们的谅解。此后章士钊到欧洲潜心研究学术，并在国内刊物上经常发表有关政党、宪法以及政体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为宋教仁所重视，并拿来作为民国成立时建国的重要蓝本。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黄兴襄助一切。这一时期，“国内事务方面，黄兴似乎行使了比孙中山更大的权力。据胡汉民回忆：先生（孙中山）以余为总统府秘书长。各部部长之职，则采纳克强意见。”^②另一同盟会元老张继在回忆中也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

① 《近诗废疾·初出湘》，《章士钊全集》7，第202页。

② （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一般趋炎附势者，则概称克强为‘克老’。^①这些当事者的回忆，可见当时革命政权的一派新气象。这就是平等，不争权夺利。同时，也从一个侧面看到黄兴在当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革命政权中的影响力。

本来，孙中山早在伦敦时，曾许诺章士钊为总统府秘书长，由于回国太迟，也因其他原因，当章回到国内时，秘书长一职已由胡汉民担任。章感到没有什么适合他的职位，也不愿意担任其他职务。黄兴因为大多部长没有到任，要章任选其一。章则答曰：“否否，吾有铁饭碗在，公何忘耶？”黄兴本身就是个无争的人，他很快就明了章士钊的意思。于是，章士钊这个无党派人士担负起了党报《民立报》的主笔。终因勇于代民立言，与当时多数党员意见相左，很快又辞去了职务。就是黄兴本人，在临时政府任内一直是个帮忙人，也没当过什么像样的官。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其中湖南人所做贡献更大。黄兴也好，章士钊也好，在这一革命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谁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种无争的精神是多么宝贵的品德。

“二次革命”，流亡东京

由于辛亥革命领导者，尤其是以黄兴为代表的“无争”精神，胜利的果实很快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

章士钊辞去《民立报》主笔后，与扬州王无生创刊《独立周报》。当得知王暗中接受袁世凯津贴后，便失去了写作的兴趣，没办几期就停刊了。正好黄兴在孙中山之后，也受到袁世凯之邀赴京，黄便央章同行。章则说：“君且不免为曳尾龟也，独

^①《张溥泉先生全集》，1951年台湾版。

不畏尾大不掉乎？”相与一笑而罢。

这次黄兴到北京受到袁世凯非常隆重的接待。途中，发布了黄兴为陆军上将的命令，并派国务员多人到天津迎接。在盛大的欢迎宴会后，袁世凯夸奖：“黄克强人甚笃实”。黄兴也称赞袁“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深致倾服。”通过几次会谈后，孙黄与袁世凯达成了八大纲领，即：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各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①

黄兴到京不久，章士钊由于受到国民党人的怀疑与诽谤，加上也想到北方看看，终于于1912年冬到了北京。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欲借宪法以达到称帝的目的。知道章士钊精通宪法，又不得志于国民党，便由孙毓筠介绍来见。袁对章士钊“礼意稠叠，计无不从，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馆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所责于钊者，亦《宪法》为之‘当家’而已。”加上袁与吴弱男祖父、父亲的关系，便认为可以托付章士钊大事，促膝深谈，将谋为帝制等事全部告之。章士钊感到窘迫而又害怕。宋教仁被杀害后，袁世凯当着章士钊的面说宋为黄兴所杀，诬蔑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等等。章士钊对此非常气愤。第二天，章士钊连行李、仆从都没带，一个人跑回了上海。

在这之前，孙中山、黄兴虽然受到了袁的隆重接待，孙中山得到了袁世凯空头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黄兴也被授予陆军上将衔。但面对袁世凯的专制以及对革命者的镇压，孙、黄等志士仁

^①《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人又拿起了反抗的武器，发动了“二次革命”。

章士钊一到上海，就访问黄兴。黄兴正准备举兵南京，开展二次革命。于是，章士钊拿出《讨袁之檄》以助其事。接着，他又与章太炎先后到武昌，游说黎元洪，但没有成功。由于力量的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这以后，国民党才重认章士钊为政友。以后，在岑春煊讨伐袁世凯称大元帅时，章士钊为秘书长，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其主要谋士。

多年后，章士钊看到唐生智录黄兴讨袁通电后说：“此赫然吾之手笔也。50年后，犹能动人心弦，勤勤记录，则当时言非外烁，黄先生有其本来，可想而知。”^①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志士大多逃往海外。十之八七，麇集东京。孙中山追究军事失败原因，认为是军令不统一，党员不听党魁号令。于是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以打手模的形式表示服从。同时，认为失败的责任在黄兴。孙、黄矛盾表面化。黄兴明知事非如此，但他不想辩解，只好离开江户，前往美国。黄兴走后，黄派军人并没有跟着孙中山，而是别树一帜，成立了一个名为欧事研究会的组织。章士钊为“该会书记，所有对外文字，大率归余执笔”。他后来在《欧事研究会拾遗》一文中针对周震鳞（道腴）回忆录中所说“半数为湘人”补充道：“所谓半数湘人，不尽省记，除理鸣、道腴及余三人外，军人如三程、张润农、刘昆涛，文人如彭静人、欧阳俊明、刘式南、李执中辈，综计亦不达半数（当时会员，恐不止20余人）。又其实执该会牛耳，指挥一切者，并非半数之湘人，而为极少数之滇人。依余所忆，凡集合同志，谋定后动，或余草拟对外文字，而来与余衡量局势，斟酌词句者，非他人，乃李印泉也。”^②

①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8，第319页。

② 《欧事研究会拾遗》，《章士钊全集》8，第281页。

李印泉即李根源，云南腾冲人，同盟会元老。同章太炎、章士钊都是好朋友，与章士钊抗战时一道在重庆，互相唱和，写有不少诗作。章的《孤桐诗稿》就是委托他保管并带往云南的。欧事研究会实际是按黄兴主张，由流亡在日本东京的革命者自行组织的团体，在反袁上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致。当时名义上是因为欧战爆发，将影响中国局势，以对其展开研究，实际上是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其宗旨是：“（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主义。（四）关于军事进行，由军事人员秘密商决之。”^①章士钊的盟兄张继曾说：“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余对于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不立界限，凡讨袁行动，尽力助之。行严辅西林到倭筹款，余助之。总理命余之事，亦莫不为之，总期倒袁收功，同志团结耳！总理对克强本无介蒂，克强亦欲辅总理，惟部下存门户之见，余颇周旋之劳。”^②

在孙、黄意见严重分歧时，黄兴采取了逃避的态度，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但仍被人误解。一次，章士钊与周孝怀去拜访孙中山。孙叹息说：“吾革命不成，因君不肯相助。”并说：“行严左挈岑西林，右携黄克强，二力见辅吾何功不成。”章士钊答曰：“公何言之易也！西林吾新相识，孝怀则旧主宾，性习盖深知之。此公岂容易听人指挥者？夫彼为逊清遗老，原与吾党无瓜葛谊，一旦强之濡迹，相率亡命，吾党不仅无一语相慰，且骂之为官僚，排之不令预事，吾有何面目，更为耳语，使趋事公？至克强与公共事尔久，忠心耿耿，人无间言，今虽稍有痕迹，然吾敢

① 蒋永敬：《欧事研究会的来由与活动》，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

② 《张溥泉先生全集》，1951年台湾版。

保公有命令,彼无不从,何得有人从中牵曳为?’^①

在孙、黄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后,确也有不少人出面做工作。欧事研究会同仁大多很快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就是孙中山一边的人,也非常注意团结。胡汉民在筹办党刊《民国》杂志时,再三要求章士钊协助,但章坚辞不就。章认为,胡汉民拉他编杂志,“可见孙派自孤,谋党内外大团结”。^②可能是章与黄性情一致,关系又非常密切,他才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当他办起《甲寅》杂志后,引来了各种非议。后来,黄兴回到了国内,与孙中山团结一道反对袁世凯。章士钊虽然参与了这一重大活动,但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黄兴去世前,曾要章从岑西林的日本久原借款中分一部分作为革命经费,章认为岑的经费已用得差不多了,商之必然不成,反而让桂系军人蔑视而予以拒绝。不久,黄兴去世,章深感愧对良友,非常自责。

可贵的“无我”精神

黄兴去世后,安葬墓地多次变化。先是想葬在昭山,那里风景美好;后又曾有归葬长沙东乡祖茔的打算。这些,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上都及时进行了报道。最终黄兴归葬长沙风景名胜地岳麓山。但黄墓有碑无文。“剧伤羊祜碑仍在,为识扬雄字失奇。”⁴⁰ 年代章士钊在《独秀书来促写杨鹏升父墓表》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并注明,谓克强墓。原请蔡元培作,而蔡又等章士钊提供行状。一误再误,故有碑无文也。^③

其实,有碑无文,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由于历史的误会,孙、黄二人曾有意见不同。这本是极为正常的事,但在封建意识极强

①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8,第320、321页。

② 引自周聿峨、陈江民的《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章士钊全集》7,第272页。

的国度，则视之为一件大事。加上后来的统治者蒋介石又以继承孙中山衣钵而自居，这对黄兴的历史评价就更难办了。全国解放后，章士钊才写下了两篇怀念黄兴的文章，公正客观地评价黄兴其人以及其对革命的历史功绩。黄兴的精神才为世人所了解。

黄兴精神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这是黄兴的本色。据传早在黄兴年轻时，乡中有曾姓恶霸，因垂涎邻家一美貌妇女，竟然将其丈夫陷害坐牢，再把她抢到手中。黄兴对此愤愤不平，一次乘与其同坐酒席时故意弄翻碗里的汤，把曾的衣服弄湿。曾大发脾气，骂道：“哪一家的猪崽子，竟这么没礼貌！”黄兴大声辩道：“我弄脏了你的衣服，你不能原谅；你奸污了人家的妻子，人家怎么能忍气吞声呢？”曾想打黄兴的耳光，黄眼明手快，揪住曾的辫子拖出席外，拳打脚踢，把曾打得眼红脸肿。在众人的劝解下才放了手。从此之后，曾恶霸再也不敢欺压乡人了。^① 以后的反清反袁，都与此一脉相承，关系极大。

2. 大公无私，不怕牺牲。黄兴以“无我”作为立身准则，大公无私，勇往直前，虽九死一生，仍屡败屡战。辛亥革命前的每一战役，几乎都由他亲自领导；二次革命，也由他指挥。这些战争，大多以失败告终，他也落下了“常败将军”的雅号。实则为了革命，黄兴置自己生命于度外，勇于负责，不怕牺牲。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三路人马有两路不能参加的情况下，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带上自己年仅18岁的儿子黄一欧参加战斗。这种大公无私，不怕死，勇于牺牲的精神，是何等可贵？

3. 顾全大局，“无争”第一。黄兴少时在家读书之外，喜欢“听乡间长辈谈洪杨革命事迹，特别是太平天国攻长沙的故事，

^①刘志盛：《黄兴轶闻一则》，田伏隆主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85页。

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黄兴后来对人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兄弟，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我决心革命的当时，就留意于此，我当时所联络的弟兄，以两湖等处的会党为多，这些弟兄，大半是承太平天国余绪的后人，我联络他们，首先引这事为鉴戒，告诉他们说：我们当革命党，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我取名軫氏，就是前车既覆，来軫方輶的意思，也就是我们革命党弟兄，不要再蹈太平天国兄弟覆辙的革命要件。”^①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80人中有70人是黄兴的旧友，其他10人有3人是孙黄共同的日本朋友。但黄兴仍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自己甘于担当副手。辛亥革命成功后，他不就大元帅之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建党问题上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时，他远走海外，维护党内团结。“功不必自我成”，是黄兴的名言，也是他宝贵的品质。

4. 经世致用，勇于任事。黄兴在日本读书期间，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进一步高涨，黄兴本人也是最活跃的一分子。当年同在弘文学院求学的鲁迅说：“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诚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习室去而已。”^② 他

^①李贻燕：《纪念黄克强先生》，杜元载主编：《黄克强先生纪念集》。

^②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的“笃实”名言，更成为中国著名家训之一。

5. 平等民主，蔚然成风。我们前面谈到的南京临时政府情况以及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成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按手印，向党魁宣誓，黄兴坚决不同意，最终远避海外。这种坚持平等民主的风气，着实可贵。

黄兴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杰出人物，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不朽伟人，他的所作所为，又光大了湖湘文化。尤其是他的精神，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质，从中我们看到了湖湘文化在传统中的重要位置。

“无争”并非完美无缺，也有他本身的不足。黄兴由于本着无争的精神从事革命活动，“功不必自我成”，不争名争利，固然不错。但革命的大名大利则不可贸然放弃。在武昌起义后，为了争得袁世凯对革命的支持，黄兴许诺袁当第一任总统。后来又为了实现这一诺言，极力主张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这种行为，无疑是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助长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表现了其软弱性。当与孙中山发生意见不一致时，黄又不肯解释，以致不少人认为是他不服孙领导。如此等等，无一不暴露了“无争”的缺点与黄兴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不足。章士钊的“无争”则难能与黄兴相比。在黄去世后，他一度做过段祺瑞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并在新旧文化与新旧文学上与胡适等人开展过争论，成为了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历史上走了一段弯路。但我们也不能苛求于前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无论是黄兴，还是章士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无争”作为一种品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与仿效。

章士钊与章太炎

章士钊与章太炎是结义兄弟，他们一道宣传孙中山，编辑《苏报》，反抗清朝，主张建立共和体制，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探讨政体问题上，提倡联省自治，但结果事与愿违，为军阀所用。在文化教育观上，他们主张读经，坚持文言，虽与时代潮流不合，其用意在于保存国粹。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瑕不掩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二章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章太炎是古文大师，鲁迅、钱玄同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聚集在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客观上培养了新文学运动的主将。章士钊也是古文大师，特别钟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终生不改，晚年以文言写作并出版了百万字的《柳文指要》。“五四”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则是章早年在《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的同事、朋友。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这两个反白话大师，却都为新文学培养了重要干将，都同新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阿兄狂态，平生不及。”^①章士钊这一发自肺腑的诗句，道出了二人的相同与差异。

结义“爱国”，《苏报》震动世界

1903年4月，章士钊受当时学潮影响，与林力山一道，带

^①《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章士钊全集》7，第253页。

领从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三十多名学生来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活动。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相识，并结为异性兄弟。这四人后来都成为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

张继（1882—1947），河北沧县人，原名溥，字溥泉。1899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参加东京留学生青年会，开始革命活动。1903年与黄兴、钮永建等组织拒俄义勇队，被逐回国。在上海任《苏报》参议。《苏报》被封后，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辛亥革命后，任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长。1908年赴法国，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1913年4月，被选为国民党参议院议长。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他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参加了邹鲁、谢持等在北京召开的“西山会议”。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晚年曾主持国民党党史和民国史的编纂工作，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1947年12月15日病死于南京。编有《张溥泉先生全集》及《外编》。

邹容（1885—1905），1903年加入爱国学社，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写成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倡言反清革命，号召推翻清廷，创建中华共和国。颂扬革命为世界之公理，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遭到清廷和上海租界当局的迫害，《苏报》案发，章太炎被租界当局拘捕，邹容自投捕房，一同入狱于提篮桥的公共租界监狱。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21岁。章太炎有诗《狱中赠邹容》传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糗。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①

^①《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当时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著作，一次邹容突然问章士钊：“大哥为《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溥泉为《无政府主义》，子何作？”章士钊只好苦笑，深感惭愧。^①于是据日本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编译成一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笔名出版。由于疏忽，作者将孙之真名（孙文）与化名（中山樵）的姓连缀成文，于是孙中山之名，便从此传开。章太炎为该书题词，称之为“索虏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噍。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②给予了高度评价。

章士钊到沪不到一月，就受聘为《苏报》主笔。在他所编辑的《苏报》上，由于连续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序》以及他本人所写的《读〈革命军〉》等反清文章，影响很大。在当年7月7日，被清政府勾结的上海租界当局查封，章太炎、邹容也先后被逮捕。章士钊本人因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原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被追究。在1927年2月19日出版的《甲寅》上刊登《章太炎集外文》时，章士钊以主编加附识云：“‘苏报案’为中国革命史中大狱，当时甚为煊赫。愚固是报中主撰，名捕独免，此办案者江苏候补道俞恪士先生特私于愚，愚耻之而无如何。章、邹本可扬去，故意就逮，以示风节。狱中宁静之态，读此二书，可见一斑。原案本六人，号六君子。实则除章、邹外，惟龙积之（泽厚）略有时望。余三人，一陈仲岐，为苏报馆主陈梦坡之子；一陈（程）吉孚，为馆中账房；一则钱保仁也。审此，革命党滥窃时名者，夫岂少哉，录竟怆然。”^③表达了他的不满。此外，他还在《孤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年版，第 447 页。

② 《章士钊全集》 5，每 597 页。

③ 《甲寅》第 1 卷第 43 号。《章士钊全集》 未编入。